

数字资本主义“隐秘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涂良川

【摘要】数字资本主义将数字技术充分应用于资本增长的全过程,使数字技术偏离了表征人本质力量的轨道,以隐秘叙事的方式维护资本的运行逻辑、拱卫资本的政治本质、助力资本的增殖。洞见数字资本主义如何以资本的逻辑“绑架”数字技术,使其成为重组生产、转移价值、隐藏劳动的工具,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是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问题。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中科技的进步与文明的昌明服膺于数字资本的控制特性、剥削属性与政治本性,产生了数字时代劳动的“自由的不自由”“创新的非创新”“个性化的非个性化”等重要的社会 and 存在难题。数字资本主义遵循资本特有的逻辑,创新了资本增殖的模式、价值转移的方式和生命定制的形式,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掩盖了隐藏于数字文明后的资本逻辑对劳动的全新强制、对价值的隐蔽转移、对个体的生命规训。因此,面对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驱动资本增殖的事实,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隐秘逻辑,才有可能使数字技术成为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力量。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隐秘逻辑;数字时代

【作者简介】涂良川(1976-),男,重庆云阳人,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哲学(广东 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保定),2024.4.39~49

【基金项目】第七批“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奇点论研究”(21BZX002)。

在技术加速的今天,资本增殖的逻辑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技术的高速增长,为生产本身的积累创造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另一方面,技术范式的变化为资本自身转换能力提供新的条件和方式。而且,按照皮凯蒂的观点,当增长不足以满足资本增殖需要的时候,那么转移就成为资本增殖的不二选择。但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却以其特有的逻辑将增长与转移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资本增殖的全新模式。特别是数字技术及其体系对资本主义的深度介入,不仅使资本表达和行使增殖的中介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以技术编辑的方式使资本增殖的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当数字资本主义

将数据生产资料化后,创新驱动、应用和转化数据的方式就成了资本增殖关注的核心工作之一。

数字技术以去政治化的政治化,通过编辑使信息被物化,其创造的“历程与软件——作为一种独特的劳动过程和产权形式的对象”^{[1]284}代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盛行与成功,这不仅得益于其开创了利用、驾驭和激发数字技术之于资本增长的能力,使资本与技术的存在形态、生产的组织方式、财富的表达对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资本逻辑从“泰勒制”的直接集中形态发展成为“数字制”的分散集中形态,而且得益于数字资本在改变资本形态中开创的非集中的集中形态,在迎合资本表象自由的过程中以去私有

化来强化私有化,在实现对生活数字化、交往虚拟化和存在孪生化的过程中“掌控和‘赋能’”^{[1]284}感觉,使之服务于资本积累生命时间的本性和积聚财富的本能。或者说,资本的数字化使资本存在形态中的中介、工具或环节,发展到一种元存在,不仅是因为表达为数字的数据、驱动数据的数字技术、私有化的数字资本等,而且体现为信息网络、人工智能技术、计算系统等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度介入的工具和动力,并且也从资本产权形式、资本介入逻辑、资本增殖发生过程和资本积累机制等方面隐藏了资本的野蛮性与政治性,还从生产组织的模式、劳动进入的方式、从业模式的逻辑等方面深度掩盖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支配性与控制性,更从技术的先进、劳动的自主、产销的精准等方面将数字资本粉饰成尊重科学、倡导自由的社会力量。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数字技术的充分发展及其对社会运用逻辑的深度介入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但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深入生产与生活的软件、加速崛起的人工智能却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财富演化成资本的新形态,使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资本存在的全方面、资本增殖的全过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3]5},使“数字化已经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元趋势”^[4]。而且,“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术语赋予数字资本的科学、进步和文明的形象深度隐匿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性,使“技术的社会化应用所带来的分工、协作方式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结合形式的更迭”^[5]承担资本的政治性。这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以技术之名、科学之态、文明之新和自由之状,隐藏、掩盖甚至是美化资本,不仅是资本维护自身利益、巩固政治本性和实现增殖本质的顺势选择,而且是资本与技术深度绑定的超现代性后果。数字资本主义重组生产、转移价值和隐藏劳动,并非意在为社会个体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为社会整体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历史进步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是为了将人有限的生命时间牢

牢地绑定于资本的增殖之中。因此,面对数字资本主义重组生产、转移价值和隐藏劳动的隐秘叙事,我们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视域中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中技术本质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反逻辑,更有必要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中隐匿着资本政治的剥削本质。

一、数字化重组生产与资本强制的劳作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重组生产、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呈现出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强制性地猎取他人劳动的政治与经济事实。这不仅是这个时代生产对象的变化,更是这个时代生产方式的更新。因为,数字技术在集成人类既有技术的前提下获得了全新的能力,“将具有形式规整性的东西与更混乱的东西——非数学的形式、语言学、视觉对象及符码,以及从生态到色情、政治领域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混到一起的能力”^[6]。这使得数据的生产资料化不同于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等的生产资料化。它是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成果深度整合的生产资料化。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以科技为支撑的数字技术替代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体系”成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7],强化资本载体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数据资本取代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推动资本虚拟化和中立化,进一步隐匿资本的政治性;以算力、数据、模型和网络将产销精准化做到极致从而消解传统资本大水漫灌、生产迟滞等难题,隐藏了及时性反馈、目的性生产、精准性投放的本质——加速资本回流、加快资本运转、加强资本增殖的中介与手段。

数字技术对数据的科学强化和生产转化实现了生产的数字化重组,使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不仅使资本的载体从传统实物、信用或象征物变成了今天的数据,而且更从底层逻辑上强化了强制劳作的生产逻辑。数据的生产资料化,不仅是数据技术成为社会事件的直观表达,更是资本在特定条件下极力推动的政治事实。按照希勒的观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

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12]。因为,数据并非符号的组合,而是基于特定逻辑的信息编码,这不仅使生产数字化成为可能,而且还使数字化成为强化劳作的中介与工具。虽然编码信息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事实,但是唯有经由数字技术转化的信息编码,由被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收集的,记载于文献、潜藏于行为、主导着活动的数据,才由表达既定事实的逻辑成为被资本追逐的商品和资源。因此,数据的生产资料化与传统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生产资料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即,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数据的生产资料化是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成果和生产主体等多元一体的结构化与固定化。经由数字化重组的生产,既具有传统资本集中控制的能力,因为数字化的技术支撑与运行保障更加依赖于资本;又使劳作过程表现出灵活、多元和自由,因为数字化重组的生产可以技术性消解劳作主体进入与退出对生产的整体性影响。

因此,数字化的数据是一种可以被开发的原料,可以产出外溢于数据的全新产品的有用之“物”^[8],但却不是一经消耗就不复存在的实体之物,是重组生产的现实力量。数据的“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9]51},使其不仅不会因为被开发与应用而被消耗,反而会因为其本身就是对生产的重组而在被应用于生产、被开发成产品、被外化成对象中再次增长和丰富。显然,数据的增长不再单一地依赖于当下人的活动,而是全面的人类劳动的结果。因为,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等的基础与前提是表达为数字技术的社会历史性生成的“一般智力”,表达新的内容、结构和趋势的数据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因此,数据作为由“管理人口、创造经济增长、维护国家安全”^[10]的计算机生成的产物,正以“看得见的手”产生自由又控制自由。一方面,数据在应用消耗中增长,不仅生产了再次生产的对象与前提,而且进一步展开了分配、配置和流通的有效逻辑,从而全面推动生产逻辑的数字化。而且,“数字化正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改变工作,改变商业战略、工作概况、组织政策、生产链、就业形式以及劳动关系”^[11]。另一方面,数据的

逻辑切分与网络组合都在网络与平台中完成,其信息的整体性使其零而不散、微而不弱、隐而不逝,既能够匿名去个体化地分发众包劳作内容(数字资本主义依赖平台和强化平台的根本原因)体现劳作竞争的公平性、提升劳作的直观获得感,又隐藏了维系数据增长、平台运作、生产展开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环节,使自动化服务成为灵活积累的工具。

生产方式、生产对象和生产成果的数字化,既肩负着生产对象与生产空间的改变,又承担着劳动过程的延长与劳动组织的整合的任务。简单而言,数字资本主义在推进数据生产资料化过程中,虽然没有否定表达为经济力量的“货币的权力”^[12],但是却强化了数据流通、数据产出和数据应用对生产物理空间的消解、对生产主体的弥合。比如,以数据为基础的平台,不仅产生了非物质劳动的新劳作方式,更是将传统劳作更有效地整合于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之中。由此,数字资本主义在物理意义上使处于不同空间的生产主体获得更多的劳作机会与收入源泉,既解决资本自身的经济成本压缩的问题,又表达自己去政治化的形象。因为,以数据为基础搭建的平台,在直观上以消解泰勒制的层级架构的方式连接不同的劳作个体,既能够完成对劳作主体的全方位审视,又能够使劳作主体获得劳作自由的感觉。但是,数据本身作为信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在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中,生产资料的身份也没有去除。因此,实现资本本性的任务也一直被数据的占有者和运用者所葆有。于是,数字资本主义以消解物理空间限定的劳作自由,植入了全新的劳作方式和劳作关系,既使劳作形态、方式和逻辑等呈现出共享、自由和自主的表象,又使劳作主体必须“接受新的约束和物质上的不安感”^[13]。即是说,数字资本主义在对生产的数字化重组中,既迎合了技术发展的一般趋势,又隐匿地缔造了支配劳作的拓扑空间,为数字资本超越地域边界、文化疆界和政治封界创造了条件,使资本再次化身为普照的光。

因为,数字化重组的生产,使人自愿地被强制于数据的开采与生产,并被数据中介化成受众商品。

数字资本以数字化重组生产,一方面使传统生产逻辑更加“科学化”“精准化”“固定化”,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强制劳作时空、能力和基础等必要性条件的限制性;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利用数据作为原料与产品的双重属性,创造了新的强制劳作的生产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在生产进行数字化重组中,数字资本一直宣称其提供了免费的服务、自由的选择和共享的条件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号称免费的平台,本质上也并非免费;坚称自由出入的平台劳作者也并非自由。数字资本占有者、数据资源使用者和数字财富的生产者,在数字化重组中形成了实现数字资本增殖的逻辑,这既是数字化重组生产的逻辑需要,又是数字资本强化劳作的现实起点。比如,重组生产的数字化平台,“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14]49}。而且,由于数字资本显然不是作为信息的知识,而是一种能够实现自我增殖的信息,其以记录、呈现、预测、规范和引导的方式实现着人活动信息的聚集,在收集、存储和处理中形成重组生产的逻辑,以“等同于金融资本”^[15]并以技术逻辑的方式深植于生产之中,这不仅形成了数字技术封闭中的“数据殖民主义”,而且“将数字时代的边缘人群连入互联网,通过开放市场将人们绑定在平台中,进而通过挖掘数据获取利润”。“帝国主义策略在数字时代重演的同时呈现新特征。”^[15]显然,这和资本传统向外输入产业逻辑、行业标准和市场体系在逻辑上别无二致,但却比传统资本输出、行业绞杀、劳作控制更加彻底和严格。

因此,数字化重组生产作为人类历史上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成果,推动了基于工业化整合生产的历史进程,开启了人类生产全新模式。但是,数字化重组生产在服从资本逻辑中,却实现了以倡导出入自由、劳作灵活和机会平等的方式掩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数据挖掘、算法定向和及时反馈达成精准生产的途径,美化了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劳作意义的丧失;以流量引导、虚拟孪生和娱乐劳动的自在掩

饰资本强制劳作的价值虚无。如此看来,数字化重组生产是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积极成果,但是其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劳作的艰辛、打破资本的强制、实现劳作的意义,而是成为资本增殖、将人连根拔起并再度异化的隐秘逻辑,进而为数据化转移价值创造了前提性条件。

二、数据化转移价值与资本强力的占有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据化转移价值的财富掠夺,将资本打造成强力占有剩余价值的政治工具。这既是当代资本主义坚持的信息技术与金融的交叉创新的必然结果,更是数字资本主义打造新的价值来源、创建新的积累工具的重要成果。数字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其对财富的占有,极力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流动,反对“数字主权”的隔离,全面发挥数据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这不仅意味数字资本主义将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和挖掘数据等视为数字资本的基本规定,而且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更以应用数据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增殖。或者说,数据不仅是资本实现增长的方式,而且是资本实现价值转移的中介与工具。因为,无论是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的数字化拆解与组合,还是其形成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的劳动买卖逻辑,其目标都是劳动产品的转移,并且是以数据化为形式的转移。

数字资本主义以数据化的科学性、效用性和中立性隐藏了资本攫取价值的真实过程及其政治本质。因为,数据化具有摧毁空间限制、提升时间效率、精准化流动方向、集中分散力量等正负面相。一方面,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和资本形态的数据化,给价值流动带来了低成本的高效性、跨行业的便捷性、调领域的及时性和超政治的中立性,有效解决了生产对资金、技术和生产条件等需求,带来数字时代生产的繁荣。另一方面,数据化的科学逻辑一旦被资本逻辑绑架,就在运行速度的加快、运转周期的缩短和增长率的提高中使资本获得了进一步的增长,并因为数据化使得资本易于集中、便于扩大从而形成垄断,不仅强化了传统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而且形成了数字资本以租赁为形式的技术征用。

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下,数据化服务于资本增长的价值转移。数据化科学逻辑的潜力虽然被充分释放,但是却既在利用数据优化系统、建构模型、管控物料和建构功能中进一步挖掘既有生产体系价值增长的潜力以服务于资本,又在用数据为用户画像、为流通搭桥、为整合铺路和为产出宣传中打造资本服务于社会需要和个人生活的形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数据化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能够为资源的有效利用、资金的精准投放、生产的成本节约、价值的持续增长、循环的有序展开等提供现实的便利。但是,数字资本主义却利用数据化重构社会生产来为自身谋利,将其为社会生产与发展带来的便利转化成了价值转移的手段。一方面,数字资本是基于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衍生出来的新型资本,既以数据化充分吸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新生产力发展的便利性和适应性,又以数据化实现增值价值的转移和非资本价值投入价值的转移。另一方面,数据化不仅使投入的资本化身为数据,而且使数字技术和数据的自我增进都成为塑造行为方式、重组生产要素、开发生产潜力和转移价值的有效工具和特殊中介,使增长与转移统一于数据之中。或者说,数据化是人工智能时代被资本主义选中的形成价值增值与价值转移相统一的“天选之子”,资本以其文明性推进先进技术落实到社会运行逻辑中,在助力生产体系、流通体系、交换体系和分配体系的数字化时被资本借用于转移价值完成积累。即,“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获得超额利润,将数字技术作为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的重要手段,通过数字资本逻辑完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体系建构,企图对全世界进行新一轮的数字殖民扩张”^[16]。

数据化为信息权向价值转移权铺平了道路。从事实逻辑上看,数据化是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过程、场域和管理等方面的数字化,是现代技术对生产的深度介入与全面升级。但是,数字资本却以数据化的方式,一方面强调了数据的资本属性,另一方面形成了资本的全新逻辑。数字化的大数据是“一种

权力范式”“一种权力叙事”“遵循权力的逻辑”^[17]。一方面,数字化是被资本全面推动,建构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组织逻辑和扩张逻辑,使资本获得了全新的存在形态,使数据成为资本掌握的首要资源,因为,数据“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越多,用途越多”^{[14]46}。因此,数字资本通过强调收集、存储、开发数据所形成的所有权来实现数据化的价值转移。表面上看,数字资本主义充分实现了数字资本的经验功能,实质上则是为建立数字帝国而努力。另一方面,数字化使数据的静态描述成了动态的价值生产。

数据化的价值转移是忽略信息权利的价值占有,不仅能够完成社会主体原初数据价值转移,而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体活动数据的价值转移。数据化的价值转移是基于一定的数字平台、基础设施、驱动逻辑的价值转移,它使价值的转移不再具有传统生产体系中劳动交换的平等逻辑,而是以技术的方式在使消费者转化成生产者的过程中完成对价值的占有。一方面,作为价值生产者的劳动者因为是追求物质享受、表达自我本质、建构自我本性的消费主体,在关于自由的想象中,不自觉地完成了价值生产。这里蕴含着数字资本占有的两种类型的价值:其一是由作为生产者创造的价值,其二是能够转换成价值的记录着活动主体的数据踪迹。由此,数字资本主义将政治价值转换成个体的生活价值,既使资本主义政治价值微观化,又使个体生活价值政治化,完成了政治与生活的合一。因此,数据化的价值转移实现资本政治本质的隐匿,是双重维度的:一是资本增殖的外在促逼转化成了生产个体的自我促逼;二是价值转移了既有生产的成果,还包括为了获得这种生产成果而不得不前期投入的价值。另一方面,数据化的价值转移是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价值转移。数据化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生活工厂化,而且是全面介入生活的工厂化。数据化不但解决了微观价值的积聚和表达的问题,而且解决了集中生产的微观化的问题。从宏观上讲,尽管今天的数字技术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依然充当着监视工具之一,但是

数字资本主义却凭借知识消解了资本统一压制的直观面相。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将价值增长场域化整为零、以积零成整完成价值积聚、用技术回复替代价值转移。从微观上讲,数字资本主义在个体解放的直接性上做好了工作,使个体不再因为工厂制度的刚性、直接绩效的量化、工作时空的限定成为个体自由的樊篱。因为,数字资本让从业者可以自由选择、随意切换和随时从业,将自由个性、平等主体和等价交换等经济和政治价值下探到个体的职业生涯之中,使个体在工作体验和自我气质上更符合技术繁荣时代的自我认知。

数据化价值转移充分利用数据化时代消费者就是生产者这一价值特质,以注重社会繁荣与进步面相、关注个体自由发展和从业自由体验的方式重建了符合资本价值增值和转移的商业原则。数字资本主义作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当数字资本通过基础设施改善、行为逻辑重塑、生产组织优化和消费方式创新而全面深入整合到生产生活之中的时候,就是人生产活动、消费行为和价值表达充分数字化的时候。由此,数字资本要实现价值转移的“平等交换”显然不再是传统场景中的支持金钱的自由买卖,而是消费者就是生产者的全新交换逻辑和转移逻辑。因为,被数字资本主义奉为主臬的大数据本质上是由人构成的,特别是由人的现实的社会活动构成的。因此,数字化带来的产业进步、虚拟化带来的行为拓展、数字孪生倡导的虚实交互等被数字资本掌握的技术,就不再是充分体现人类社会生产发展、个体劳动自由和个人时间充裕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是把人从消费者转换成生产者的利器。表面上看,数字资本主义为数据的“收集”“采集”“开采”“利用”等倾注了心血、用尽了心思,实质上数字资本主义却是在强调大数据就是人,而且是人的商品化,是人能够在这个时代进入数字网络、进行数字生产、创造数字利润的“商品”。因为,被数据化的人(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表达出来的人),不仅是可流通、能增值的商品,同时也是可以进一步预测商品动向、实现价值转移的中介。正是通

过“不死的事物——商品的关系”^{[10][135]},数字资本把表达为数据的人的活动开掘到了极致。因为,数据化在重述商品的抽象性时,使那个表达资本魔力的幽灵再度复活,它“使(内部的)事物或用途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赋予了迄今为止无法(感性直观)获得的共轭轴。因为它是一个幽灵,所以它不再是一个事物或劳动”^[18]。显然,数据化实现了社会活动的行为主体与数字资本之间的无货币的交换,既建构了人数字化的活动逻辑,更实现了资本对人创造价值的转移和人既有价值的转移。

因此,数据化的价值转移是数字资本积累、增长和增殖的核心途径。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社会生产、个体活动和社会运行等数字化与数据化,真正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事物‘放入记忆中’”^{[10][133]},既实现了源资源的占有,又延续了占有权向转移权的转换与延伸,还实现了对劳动的深度隐藏。

三、逻辑化隐藏劳动与资本强化的定制

定制符合资本增殖逻辑的劳动者、消费者和组织者,是资本生命政治的核心逻辑。这不仅意味着资本一直以存在恐惧与生存威胁行使着对生命的形塑,而且表明资本通过意识形态强化、生存方式美化和价值追求虚化等手段不断将现实的历史的人打造成符合资本本性的生命存在。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为消解传统的用时冗长、体感乏累的劳作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社会条件,而且将生产剩余数据的劳动化身为出入自由、行为多样、组织活动的数字劳动、玩劳动和自我劳动等形态,从劳动直接表达与劳动发生逻辑的双重维度隐藏了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解码与编码的基本方式,不仅完成了对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体系的重置,更是通过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和劳动追求而完成的对人预训练。数字生活、数字劳动、数字交往和数字公民,都是数字资本隐藏劳动本质的技术方式。因为,数字技术祛除了代具外在于主体的独立性及其与主体的分离性,使之与现实的历史的人牢牢焊接在一起,使人无法区分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比如进入数字环境、进行数字消费、享受数字娱乐和提供数字

踪迹等耗费生命时间、表征生命本质和生成生命本性等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都被数字资本转化成生产资料,本身就说明必须正视诸如“玩劳动”“娱乐劳动”“享受劳动”等重要问题。同时,数字资本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之下,具有将劳动高度碎片化的能力,割裂劳动者对整体性的感知和认识,以对劳动去责任化的方式使劳动者更加分散、独立,甚至是孤独。一方面,数字资本以数字技术将社会主义锁定于技术网络之中,使人一边是身体,一边是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数字中介;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希望现实的主体在数字化活动中遗忘自己的物质性,使“人们忘记了目标然后重复同一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以致真正的目的不再是原来的目标而是重复地达到此目标的运动本身”^[19]。因此,数字资本在数字技术的编辑中,一方面消解了劳动的整体感,使零散的社会活动、日常的生活过程 and 自我的私人活动都成为创造资本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掩盖了劳动的劳作体验,在泛化劳动边界中不断地将人生命活动的时间纳入价值积累与增殖的逻辑之中。由此,数字资本如同工业资本生产自己的产业后备军、金融资本生产自己的消费主体一样,将人类个体培育成满足数字资本增殖需要的“自由选择”“自行其是”“自负其责”的数字劳动者。这既是数字资本创造出来的新的治理手段,又是数字资本主义革命的生产生命主体的生命政治。

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对劳动形态、劳动过程、劳动体验和劳动价值的多重隐藏,一方面带来了假象的自由狂欢,另一方面则重新植入了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和对生命的强化定制。从显性逻辑上看,数字资本主义充分利用成瘾机制来强化社会主体对数字化与虚拟化的技术依赖,使被数字技术座架的劳动者如同传统资本逻辑中的工人一样,“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19]582}。从隐性逻辑上讲,数字资本主义在转变数字设备的功能中,使其兼具功能承担者、数据制造者、价值转移者和主体塑造者的多重身份,一方面为社会主体开放自由的活动场景和生活的享乐场地,另一方面则实现对社会主体活

动状态的收集、行为逻辑的再塑和发展方向的引导。因为,数字资本“积累的逻辑构成了认知并从根本上塑造了技术的可供性,同时也是许多商业模式中约定俗成的背景。它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默许的,因此它塑造可能性领域的力量是无形的。它定义了目标、成败,决定了测量和传递的内容、如何分配和组织资源与人员、谁作为什么样的角色被评估、应该开展哪些活动以及活动的目的。数字资本积累的逻辑产生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由此创造了自身的概念、权威以及权力的使用”^[20]。特别的是,数字资本格外强调进入的“同意”和认同的“接受”,表面上看是这技术逻辑的科学要求,实质上却是不自觉地将数字资本的内在要求内置于活动的逻辑之中。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以“标准格式”“模板合同”^[21]等进入把控实现了活动主体数据的自然交割,并使主体点击“确认”成为主体进入数字场域的直接动作。由此看来,数字资本不仅集成技术力量实现数据向资本力量的转化,更是把活动场域内容、规则和运行等都和社会主体的活动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整合起来。因此,数字资本在打造无直接控制者、出入自由、机会平等面相的时候,本身就是以主体的“同意”完成对主体的“强迫服从”“定制生成”和“合理盗窃”。

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平台将劳动隐藏为价值增值的社会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数字资本的实质,更是对人存在形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定制。如果说数字资本将普遍劳动转化成数字劳动是为了给劳动嫁接上科技的翅膀而美化劳动的话,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将社会活动转化成劳动者才是其根本的隐藏逻辑。也就是说,数字资本催生的“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不过是以劳动形态变化为表象,实质上却是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即,数字资本已使“今天的普遍社会活动不是作为劳动而是作为生产要素贡献剩余价值”^[22]。因此,数字资本特别在意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形塑,一方面,其不仅沿用、放大和创新了消费社会的既有逻辑,而且以社会活动集聚个体的有效生命时间来实现价值增值,形成数字时代的新消费主义;另一方面,零工劳动、非雇佣劳动

和雇佣劳动的结合与整合,以给劳动者更多自由、更多能力和更多可能性的方式将劳动者与数字平台深度绑定,劳动虽然在直观上摆脱了工厂监视、办公室限度和流水线定制,但实质上工人被数字资本再次要求必须随时满足平台的需要。所以,数字资本逻辑中的从业者必须遵从资本从秩序中产生秩序的原则,而且必须在数字资本驱动的技术逻辑中被再度打造,在“卷”与“被卷”之中随时准备成为数字资本的产业“后备军”。

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改变劳动形式、隐藏劳动本质、细化劳动要求和定制劳动主体的全过程,使得线上活动融入线下生活,成为资本实现增殖和变现的条件,从而尝试定制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中的秩序逻辑。从发生学上讲,正是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政治合谋才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因此,数字的可编程性自然成为数字资本实现定制的利器。因为,“软件的驱动力——追求一种将立法和执法合而为一的独立程序——并不单纯生发于计算领域内部。相反,作为逻各斯的代码早在别处就存在,而且是从别处扩散到软件领域的——它是生命政治可编程性(biopolitical programmability)更广大的认知域的一部分”^{[1]297-298}。同时,“软件几乎可以隐喻一切——文化、基因和生活——并将一切都简化为透明的交流”^{[10]90},即赋予数字资本不同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等资本形态的传统强制性面相,又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秩序逻辑的定制。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个体关系“更像是被如细胞膜质地的通透墙体维系和区隔的生命集合——他们各自为政,连接触手可及却难以跨越”^[5]。因此,数字资本主义隐藏劳动的逻辑化不但全面地规训了现实主体,而且隐性地植入了对工人整体的解构,使资本的触手不仅直接伸向了对人生命形态和活动逻辑的定制,更是伸向了可能反抗资本的政治力量的集结。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将“资本强力”定制转化为数字资本的技术逻辑,不仅使数字技术成为资本的帮凶,而且使数字资本的强力弥漫性地延伸到生活的日常逻辑之中。

当数字资本依赖概率模型来实现管控功能、利

用用户画像来达成对主体行为逻辑的形塑、以数据功能来升级个体化语境的时候,本身就是数据积累与行为监控相伴生、数据提炼与秩序分发相伴随、数据增值与生命控制相统一的过程。这不仅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获得了精准性极高的识别与挑选原则,因为数字资本可以极为便利地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身份识别、监视、监控、位置跟踪和招募目标”^[15];而且意味着数字化的社会个体为进入生活场域:一方面,不得不让数字资本无偿获取刻画生命本质和生活活动的数据,另一方面,社会个体必须在不断的自我促逼中满足被甄别、被选择和被招募的标准。

参考文献:

- [1]麦肯齐·沃克.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M].姜昊骞,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284.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602.
- [3]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 [4]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鲁云林.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 and 劳动的控制[J].国外理论动态,2019(3):27-37.
- [5]吴静.数字资本主义解构:幽灵劳动、叙事困境与系统不稳定性[J].求索,2023(2):83-91.
- [6]FULLER M.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8: 5-6.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3.
- [8]涂良川.数码物“去物化”的唯物主义叙事[J].江海学刊,2023(4):16-23.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1.
- [10]CHUN W H K. Programmed Visions: Software and Memory[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1: 7.
- [11]徐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制度批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42.
- [12]彼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M].常恒,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
- [1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

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77.

[14]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9.

[15]贾森·多夫斯基,杨嵘均,程琳.数据成为资本:数据化、积累与提取[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2):13-24.

[16]向东旭.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数字资本逻辑批判[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6):107-114.

[17]林奇富,贺竞超.大数据权力:一种现代权力逻辑及其经验反思[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484-490.

[18]APTER E, PIETZ W. Fetishism as Cultural Discours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8.

[19]斯拉沃热·齐泽克.面具与真相:拉康的七堂课[M].唐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 XI.

[20]ZYBOFF S.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1): 75-89.

[21]ZAMIR E. Contract Law and Theory—Three Views of the Cathedral[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14(4): 2077-2123.

[22]COULDRY N, MEJIAS U A.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0.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ritique of the "Hidden Narrative" of Digital Capitalism

Tu Liangchuan

Abstract: Digital capitalism fully applies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capital growth, ca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deviate from the track of representing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Instead, it uses hidden narratives to maintain the operating logic of capital, defend the political essence of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capital. Insights into how digital capitalism "kidnaps"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he logic of capital, turning it into a tool to reorganize production, transfer value, hide labor, and serve the logic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oday's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sperity of civilization in the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ism are subject to the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exploitative attributes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digital capital, it has given rise to important social and existent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freedom of being unfree", "the innovative of being non-innovative", and "the personalized of being non-personalized"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capitalism follows the unique logic of capital and innovates the model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value transfer and life customization, which uses highly develop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over up the hidden capital logic behind digital civilization on the new coercion of labor, the hidden transfer of value, and the lif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s.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the fact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drives the proliferation of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only by analyzing the hidden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ism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digital technology become a realistic force that promote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hidden logic; digital age